



鲁迅诗歌注析

林 伟◎著

慣于長夜
有絲夢裏
紅大玉旗
向刀邊質
憂刀光如
小縮衣

時挈婦孺離鄉
慈母淚城頭
朋輩成親鬼怒
吟霜似鳥之寫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鲁迅诗歌注析

林 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诗歌注析 / 林伟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8-12806-3

I. ①鲁… II. ①林… III. ①鲁迅诗歌—注释 IV.
①I2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3078 号

鲁迅诗歌注析

林 伟 著

责任编辑 包灵灵

特邀审稿 黄 健

封面设计 项梦怡 蒋 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1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806-3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序

关于鲁迅的研究，从1913年4月25日《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发表主编恽铁樵对署名“周遒”（周树人的笔名）的小说《怀旧》的点评文章“焦木附志”以来，到今天已经走过整整一百年的历史。然而，直到今天，人们还在问“鲁迅是谁？”这个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一直都缠绕着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不论他曾经是如何被推上神坛，后来又怎样地走下神坛，也不论曾经他头上戴有何种桂冠，他的多重身份，他的思想的多样性，心灵世界的复杂性，性格表现上的矛盾性，尤其是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种难以“直说”的苦楚，那种挥之不去的多疑、忧郁和孤独，那种被灵魂的“毒气”和“鬼气”纠缠而产生的苦痛，都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始终无法“说清楚”而又“说不尽”的“异端”，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中国，同时，这也是他成为现代中国最为独特，也是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内在缘由。

李泽厚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曾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青年。……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确，在现代中国处于激烈动荡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鲁迅所有的创作都是指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对于他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冲破这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精神束缚，虽然他也认识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他始终相信“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于是，他总是自觉地选择“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一点缺陷”的方式，向旧世界“宣战”，如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就借狂人之口，对有着“四千年文明”的历史，发出大胆的质疑：“从来如此，就对么？”并将历史负面的根性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形象地比喻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对历史和传统人生的解读，最为深刻、最为形象的艺术比喻和认识结论。通过文学创作，鲁迅把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由此展现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心理性格和历史命运，并深刻地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目的。

鲁迅之所以能够用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方式，来进行大无畏的质疑、批判和反省，最主要的还是源自于他对传统根底所具有的深刻认识、把握和体悟。在《坟·写在〈坟〉后面》一文中，他曾宣称：“孔孟的书我读的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并不相干”。正是置身于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冲突和融合的特定语境中，鲁迅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种新的思想高度。他给自己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可以说，居于鲁迅文学创作观念中心的，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及其对人的影响，其意义重构的中心指向是展现身为国民的“人”，如何获得精神的解放、心灵的解放，如何摆脱长期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而进入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境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文学创作集中地体现了他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通过文学而展示出来的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心理发展和前途命运，寻找人的精神归宿，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

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成就，多集中表现在小说、散文（包括杂文）创作上，而对于在他那个时代兴起的白话新诗创作，他几乎没有涉足，故也有人说鲁迅不是一个诗人。其实，鲁迅是不是诗人，具不具有诗人的名分，戴不戴诗人的桂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究竟具不具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才智、诗人的胸襟，以及诗人那特有的诗性情思，诗性境界和诗性品格。鲁迅虽然在白话新诗创作方面建树不多，但人们只要认真地读他的旧体诗，就不难发现，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他的旧体诗创作，不仅展现出了他的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和修养，而且更是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个诗人所独有的禀赋、才华、胸襟、品格、情思和境界。从鲁迅创作旧体诗的情境和心境上来

看，他的这种独有的诗意情怀、诗性精神，毫无疑问是贯穿他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之中的，这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极具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如同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却始终是这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之外，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也总是能够将“极强烈的情感包裹沉淀在极严峻冷静的写实中，出之以中国气派的简洁凝练”，从而构成他极具诗意和诗性精神的“特有美学风格”。显然，鲁迅这种“特有美学风格”的形式，与深蕴在他内心的那种诗意情怀、诗性精神是分不开的。

林伟是我的学生，他入浙江大学时学的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当年是他的任课老师，主讲专业基础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同时还开了一门“鲁迅研究”的专业选修课。当年的浙大还是一所理工科大学，文科专业并不多，尤其是像中文这种基础性文科专业，在理工科大学更是“少数派”，不像我当年上大学时，中文系通常是数一数二的大系，特别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像我这样在农村“广阔天地”插队落户的知青，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基础性教育训练，往往数理化都比较差，故选文科而学中文的比较多。我是恢复高考制度首批考上大学的1977级大学生，当年我所在的一个班就有108位学生，与《水浒传》里所描写的梁山108位好汉的人数一模一样。浙大的文科氛围并不是太好，尽管早在1928年，国立浙江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但中文学科并不是浙大的强项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文科从浙大分出，浙大成为一所单科性的工科大学，后又陆续恢复理科，成为以理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恢复文科建制，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是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浙大工作的。我到浙大时还没有中文系，我先是到临时挂靠在教务处下设立的“文学艺术教研组”，不久该教研组被并入当时的语言系（实际上是外语系），改名为“汉语教研室”，后来准备成立中文系，又改名为“中文教研室”。我也就随之先后到这两个教研室工作，学校成立恢复“中文系筹备小组”时，我也是其中的成员，在教学科研之余，主要负责恢复建制和专业论证报告的起草和外联工作。1986年浙大正式恢复中文系建制，开始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

林伟是1988年入学的，尽管文科在浙大的地位不如理工科高，但作为全国知名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考入浙大的分数仍然是很高的。可以想象，林伟在中学时学习成绩是很优秀的，各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否则也进不了浙大。林伟的个头不高，但学习很勤奋，刻苦钻研，为人也非常朴实、忠厚、诚恳。他在学校时就对鲁迅研究非常有兴趣，所以与我接触比较多。他知道我对鲁迅的研

究比较用心，所以他在课后也常到我家，就学习中的问题，特别是有关鲁迅研究的问题，与我一道探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他回到宁波老家工作，与我也偶尔有些联系，但我去香港进修，后来又留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就逐渐地失去了联系。我重新回校任教后，浙大已经是“四校”（即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合并后的大学，被称为新浙江大学。我原先任教的老浙大中文系，也就是林伟在浙大学习时的中文系，已改名为国际文化学系，一段时间与中文系一道被纳入新组建的人文学院内，不久则与新闻系一道，组建成为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属于该院下属的一个系。我回校任教后，虽然是在中文系工作，但此时的中文系，实际上就是原先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故在后来编撰出版《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时，原先老浙大中文系的系友并没有被编入，只是在大事记里作了说明，并将当时老浙大中文系的情况和人员作为附录附在系史后面。我后来与林伟重新恢复了联系后，曾开玩笑地说，你现在不属于中文系的系友了，升格了，属于国际文化学系的系友了。他当时看着我，似乎有些惊讶，然而只是苦笑一番，并没有说些什么。是啊，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人生有时也就是这么无常。能说些什么呢？就像鲁迅当年所自嘲的那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与林伟恢复了联系后，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我说，他一直都在研究鲁迅，特别是他对鲁迅的诗歌创作非常感兴趣。他对我说，他不满意目前对鲁迅诗歌的注解，决心要用自己的研究心得，重新对鲁迅的诗歌进行注释。我就对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并希望能够早日看到他的研究成果。今年暑假期间，他将鲁迅诗歌注释的文稿电子版发给我，并嘱我写序，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文稿。看得出来，他是用了心的，如同他在代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毋庸置疑，鲁迅的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在今天仍有阅读、研究，以期达到继续疗救这几千年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积淀、遗传影响的国民的灵魂的必要。本书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就鲁迅先生的全部诗歌进行阐释，以期接近鲁迅的思想，并以此抛砖引玉，能就教于专家、学者。对笔者来说，即使使大方之家哂笑，亦无暇考虑会使自己汗颜的可能。故笔者不揣冒昧，怀着这样的坚决的心情，抱着欲接近这位伟大的、孤独的思想家的魂灵的目的，试图对鲁迅的诗歌进行粗浅的探讨。”

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我开始还担心，仅凭他个人之力，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啃”这块“硬骨头”，是否真的能够如愿？即便如愿，又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能否展开他对鲁迅诗歌创作的学理性分析、阐述和逻辑论述？读完他对鲁迅诗歌的注释和研究，我心里的这份担忧，可以说是解除了。尽管我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地赞同他的注析，以及从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对鲁迅的创

作，特别是对鲁迅诗歌创作的研究结论，但我还是要为他这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给予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对他独到的鲁迅研究视角、分析、阐释和论述，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在代自序中，林伟全面地阐述了他对鲁迅诗歌创作的认识，重点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鲁迅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篇具有自己独到学术见地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到他对鲁迅思想情感和心路历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整体的高度，他对鲁迅诗歌的注析，也就避免了一般民间学者研究习惯于就事论事，紧扣字面分析而微言大义的弊端，显示出基于民间研究立场的独立性特点和学术精神。

国外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说，同样，在中国也有“说不尽的鲁迅”之说，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有两部散文文学可以百读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文章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无疑，作为一种精神生命，鲁迅在现代中国将是长存的。他“特立独行”的人生方式，“遗世独立”的人生精神，他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作为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已深深地沉积在古老民族的心灵深处，并为现代中国人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这种人生精神焕发的光芒是永不磨灭的。我想，林伟对鲁迅诗歌的注析，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从中寄寓了他通过对鲁迅诗歌创作的研究，表达出的他对于鲁迅精神的深刻领悟和继承弘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也是鲁迅的传人。

是为序。

黄 健

于杭州西子湖畔

2013年10月10日

鲁迅的诗歌浅探

(代自序)

只要有阿 Q、孔乙己们和看客们在时下中国的存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就有在中国存在的必要，这种存在也许还要继续一百年、两百年，甚或更长。其间的对鲁迅的毁誉和骂捧，只不过是墙角的蛛网罢了，轻轻地抹去了，还是无损于这思想和作品的坚实地存在地。

因此，毋庸置疑，鲁迅的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在今天仍有阅读、研究，以期达到继续疗救这几千年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积淀、遗传影响的国民的灵魂的必要。本书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对鲁迅先生的全部诗歌进行阐释，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鲁迅的思想，并以此抛砖引玉，能就教于专家、学者。对笔者来说，即使使大方之家哂笑，亦无暇考虑会使自己汗颜的可能。故笔者不揣冒昧，怀着这样的坚决的心情，抱着欲接近这位伟大的、孤独的思想家的魂灵的目的，试图对鲁迅的诗歌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鲁迅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底，为鲁迅的旧体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先生生于 1881 年，那时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未废除。在当时来说，通过科举考试以取得仕途仍是读书人的正途。特别是对于当时正在任京官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来说，希望长孙鲁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重振家业，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鲁迅于 1887 年（7 岁）入本宅私塾学习，12 岁又入三味书屋，开始了严格的旧学学习。

对于当时的私塾学习生活的严厉、枯燥，鲁迅在《朝花夕拾》的文章中进行了回忆。除了私塾，父亲对他的教育的严厉也使他终生难忘。有一次，年幼的鲁迅要到期待已久的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正笑着跳着催促家人快点搬完东西，好赶快去看会，父亲却令他须在背完《鉴略》中的二三十行书后，方可去。鲁迅当时感到“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他在《朝花夕拾·五猖会》一文中继续回忆道：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晴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①

正是这种严格的、剥夺儿童快乐身心的私塾学习和家庭教育，使鲁迅在幼年即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到了三味书屋时期，他已读完了《鉴略》和《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一经。《楚辞》、《文选》、《诗韵释音》、《唐宋诗醇》、《二十四孝图》、《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书，也认真攻读，并看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诸多旧小说。戊戌（1898年）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所购阅的书还有《世说新语》、《壶天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唐人全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汉魏丛书》、《渔洋精华录》、《池北偶谈》、《曲园墨戏》、《李长吉昌谷集》等。其中《诗韵释音》是鲁迅祖父周福清从北京寄回，要求鲁迅的父亲指导儿子学习的。后周福清又在杭州狱中寄回的《唐宋诗醇》中，夹有一张“示樟寿诸孙”的字条，指示：“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对鲁迅后来的旧体诗的学习和写作是大有裨益的。

① 《鲁迅全集》第2卷，《朝花夕拾·五猖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即使在维新派、洋务派举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鲁迅也得与旧学打交道。而在东京时期，鲁迅又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更使他的旧学境界上了一层楼。

唯其如此，使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撰著了如《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著作，在考据、校录及古籍整理中也体现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并使鲁迅在新旧文化、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之中底气十足，功绩斐然。其所创作的旧体诗歌，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二、越文化传统对鲁迅的影响^①，使他的诗歌创作既能发挥传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又能张扬个性

鲁迅对越文化传统强烈的、主动的认同感，使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并成为精神的基础。作为鲁迅出生地的绍兴，地域上属越文化的中心区，灵山秀水，人杰地灵，从古至今，人才辈出。绍兴在浙江省内，河网密布，使得生长于斯的人民“陆事寡而水事众”，在水中谋生的风险，养成了越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慷慨的气节。“智者乐水”，河网密布的乡土特色，又赋予越人机敏的性格，文化上重视个性的倾向又十分明显。作为越人的鲁迅，正继承了这样的区域文化精神禀性。

鲁迅的小说多以故乡绍兴为背景，其散文回忆录《朝花夕拾》就描述了少时的故乡生活。但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所表现的对故乡的感情，是没有表示过太多太深的留恋的。在他的晚年更是对浙江表示过明显的不满。他说：“其实浙江是只能如此的，不能有更好之事，我从钱武肃王的时代起，就灰心了。”^②所以他曾写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委婉地劝说郁达夫不要迁居杭州。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鲁迅对于同时代的会稽的所谓的士绅、士大夫之属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官吏颇多不满。他于1911年1月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③又如他在致黄萍荪的信中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④都明显表达了鲁迅对会稽所谓的士绅、士大夫之流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官吏如许绍棣、黄萍荪辈的鄙夷。

然而，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深入心灵的，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主动的越文化认同感。冯雪峰指出：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270717·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110102·致许绍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③ 《鲁迅全集》第13卷，《书信集·360210·致黄萍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根据鲁迅本人的自述、别人的追记以及我们所已得到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鲁迅在这十二个年头中读了不少的中国古籍。他不仅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并且每每有新颖的见解，而对于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的勇气。同时在所谓正统的经、史之外，对于野史和杂集之类具有特别的兴趣。因此搜寻、阅读以及抄录，也特别的勤快，而且，少年鲁迅也曾经勤于寻访绍兴的文物遗迹，抱着诚敬爱慕景仰的心情去对待绍兴府属的先贤们。而对于这些先贤中的具有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诗人、文士与学者的著作的搜寻也更为热诚。”^①

这种对越文化传统主动的了解、接触，使鲁迅对越文化的认同感极强。在晚年致黄萍荪的信中，他就以越人自居，并多次强调“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2]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又感叹：“会稽往往出奇士”，对越中先贤的赞叹是溢于言表的。他又有感于“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②以会稽书肆概括中国文章，认为家乡书肆的没落状况，可概括见出中国文章的陨落，这又是对越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的表现。因此，鲁迅广泛搜集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汇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并于1915年印刷发行，这既体现了鲁迅对越文化传统的认同，也是他对越文化的贡献。

除了主动地接触越文化，少年鲁迅还受其祖父周福清（字介孚）的影响。介孚公，为当时有名的翰林，才学不错，但恃才傲物，与时宜不合。他在仕途中，无论是在外放，还是在做居京的京官的时候，都不很得意，故牢骚很多，有名士气，时常骂人，骂人的风格很有绍兴刑名师爷的习气。周作人曾说介孚公的骂人，是家里人最痛苦的事。^③这也是导致了鲁迅从少年时就有孤独抑郁的心境的一个原因。而介孚公对子孙要求的苛刻，对子孙的教育的干预，都以越人士大夫的家风影响着鲁迅。1899年11月，鲁迅还在江南陆师学堂恭敬地抄录完毕介孚公手书的《恒训》一卷，虽然周作人认为介孚公“这一本家训算来几乎是白写”（《恒训》的内容是关于治家的种种格言，其中有关于周氏家族兴衰历史的家鉴）。

古越传统文人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东汉末年的王充（会稽上虞人），他的思想风格和鲁迅最相似。王充著《论衡》，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通过尖锐和犀利的分析，剥去他们的外衣，暴露各家显学的弱点，倡“疾虚妄”、“归实诚”；

① 《冯雪峰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56—257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110102·致许寿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③ 周樟寿（作人）：《鲁迅的故家》六一《恒训》，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编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966页。

在文学上，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虚妄，重文学的独创性和个性，主张华实相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以达到文学“劝善惩恶”的目的。这都与鲁迅的大胆揭露“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身体力行、以文学疗救国民的魂灵的观点一致。同时，《论衡》在文字的尖锐、犀利方面，又与鲁迅的杂文风格一致。尽管“现代评论派”的陈源（西滢）教授讥讽鲁迅兄弟有“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但毋庸讳言，鲁迅的杂文的犀利泼辣，的确有这种传统文风的影响，并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体现。这种文风，犀利、坚韧，精细而又显刚性，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评之为“冷隽尖刻”。影响在鲁迅的诗歌中的，如《赠邬其山》、《好东西歌》、《公民歌》、《南京民谣》、《教授杂咏》等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辛辣的讽刺，直斥的勇气，都体现了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犀利泼辣的风格，令人赞叹！

越文化传统对鲁迅产生影响的，还有越人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越之先贤，多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徐渭（文长）^[3]是在绍兴家喻户晓的人物，其故事在绍兴乃至浙江广为流传，故事无论是真是假，以其大名，不可能不为鲁迅所注意。徐文长为不第才子，怀才不遇，只得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但他“位卑不敢忘忧国”，曾亲自深入前线，研究抗倭之法，并屡建奇功。又如比徐渭更早的南宋诗人陆游，其爱国热情至死不渝（有意思的是陆游、徐渭、鲁迅在绍兴的故居相距都不远）。爱国、爱家，以天下为己任，这些都是越人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的《自题小像》中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这种爱国情怀、积极入世精神的由衷表现。

章太炎先生是鲁迅最钦佩的老师，对鲁迅的爱国精神也有深刻的影响。鲁迅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①对老师的革命爱国精神的赞叹是由衷的、充满激情的。其他如王思任、张岱、章学诚、李慈铭等，也都为越人中的佼佼者，都或多或少地对鲁迅有所影响。

另外，鲁迅在外求学、谋生时同乡观念也很强烈，其青少年时期所处于的越同乡交游圈，对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在日本东京时期，鲁迅结识了许多绍兴及浙江老乡，如许寿裳、范爱农、陶成章等，且于1902年11月与许寿裳、陶成章、厉绥之、张邦华等浙江籍留日学生一百零一人在东京组成了浙江同乡会，并出版月刊

^① 《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47页。

杂志《浙江潮》。在北京期间，鲁迅有一段时间还住在绍兴会馆，接触的大多是以绍兴同乡为主的浙江人。这些交游和经历，也都使鲁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并成为他思想及性格的基础。

因此，越文化对于鲁迅的影响，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上，使得鲁迅完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无论在表达爱国爱乡、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反对黑暗统治、反抗权势等方面，还是在表达个人的情怀如赠别、友爱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继承和发扬；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主题，既能不落窠臼，张扬个性，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又能体现冷峻尖刻、幽默讽刺的一面，并于极冷静的写实之中体现极其火热的感情，犹如冰水之中包裹着烈火。

三、鲁迅的诗歌中所表现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影响

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以及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书香礼义之家，鲁迅于旧体诗歌的写作，其出发点应是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情调的表现，他的写作旧体诗歌，是一种表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方式，是一种审美爱好。这在鲁迅早期的旧体诗歌的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1900年写的《莲蓬人》中说：

芰裳苕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这首诗歌咏赞美荷花的果实莲蓬的高洁的气质，很明显是受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的（据《鲁迅年谱》，1900年8月4日，在南京的鲁迅托返乡亲戚捎书给家中诸弟，内有张伯行刻的《周濂溪集》一部四本），但它表达了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和情调。这种崇尚高洁的主题和情调，和爱国思乡、抒情述怀等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和情调一样，在鲁迅的旧体诗中占相当的比重。《别诸弟》二组诗，则表达了兄弟惜别和兄弟怡怡之情。又如鲁迅后期诗歌的创作，有些是赠人之作，有些虽非专为赠人而作，但写好后以条幅的形式赠人，也是这种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表现。那些赠人的诗及条幅，应日本友人的索求为最多，又有应友人如郁达夫、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的索求而写作或书写的。而鲁迅自己也对中国传统诗画有深厚的爱好，他收集古代艺术品、今人字画，都是这种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表现。同时，通过创作诗歌、收集诗画以及题咏赠人等这些能

体现传统士大夫生活情趣的业余爱好的享受，对于鲁迅繁忙的著译生涯，也不失为一种业余怡情的、积极的休息之法。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对鲁迅诗歌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屈原的影响。鲁迅早年就喜欢屈原的作品，在日本弘文书院时，除了阅读大量的日文版的西方文学书籍外，就是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并对许寿裳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藪。”^①

鲁迅的《祭书神文》作于1901年2月，他写道：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夏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綢繆兮烛焰赤。
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
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
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
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
绀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螽鱼。
寒泉兮菊茝，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除除。
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
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螽鱼之来游。
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闾兮增君羞。
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
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惴惴以心忧。
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
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此骚体诗文辞典雅，想象丰富，体现了与钱神绝交、矢志读书的浪漫而清高的情怀，深得屈赋神韵，明显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又如《无题》诗：

一支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编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此诗则全用骚词和屈赋意象，从诗的表层意思来看，是歌咏赞美屈原的，表达了《离骚》和《九歌》的诗意，可见屈原和他的作品对鲁迅的影响之深。又从此诗的深层意义来看，鲁迅通过屈原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孤独的情怀。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屈原是相像的。鲁迅其他的诗如《自题小像》、《送 O. E. 君携兰归国》、《湘灵歌》、《无题二首·其二（雨花台边埋断戟）》、《送增田涉君归国》、《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偶成》、《悼丁君》等诗，不但在遣词造句上使用屈原的辞赋，而且在诗歌的意境和意象的创造上也学习屈赋，这都明显地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鲁迅在青年时代还喜欢李贺的诗，并与其弟周作人购买了《李长吉昌谷集》；1911 年还曾致信许寿裳，托许代为寻购李贺诗集。^①鲁迅在 1935 年致日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道：“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②李贺的诗歌，在反映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如反对藩镇割据，抨击宦官专权，揭露官僚豪奢，讽刺皇帝求仙，同情人民疾苦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在抒发个人壮志难酬的情怀、发泄抑郁的情绪时，则表现为感伤和愤激。他的歌诗继承了屈原辞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并致力于命意、造境、炼句、设色，具独特的艺术风格。其诗缺点是有时过于晦涩难懂，但却想象瑰丽奇诡。李贺的诗，杜牧评论为“骚之苗裔”，则与鲁迅的诗歌风格是相通的。且李贺的诗在深沉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并稍显奇耸的美，是对鲁迅的旧体诗的创作有所影响的，形成了鲁迅诗歌深刻、沉郁而苍凉的韵味。况且，为写胸中磊落有所积的不平之气，而多表现出的愤激和痛心的心情，二人是相通的。但鲁迅摒弃了李贺的悲观、寒冷和变态的内容，以及“晦涩难懂”的艺术表现手法，于绝望中寄寓希望、抗争。鲁迅的《无题》诗，是其诗中最能体现李贺诗风的：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李贺诗在炼句上颇下功夫，故其诗多有名句，发唱惊挺，耐人吟咏，如“雄

① 《鲁迅全集》第 11 卷，《书信集·110102·致许寿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1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13 卷，《书信集·350117·致山本初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2 页。

鸡一唱天下白”（《致酒行》）、“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等。鲁迅的诗歌中的名句也为时人所称道，也可见其锻字炼句的功夫，如“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血沃中原肥劲草”（《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

至于其他的古典诗人对鲁迅的诗歌的影响方面，如有的注家认为鲁迅的诗歌受了龚自珍、陆游、李商隐、杜甫等的影响，这也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教育熏陶的人，对于古代诗人作品的领会和歌咏，终至于融会贯通，汲取各家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也是顺理成章的。鲁迅便是如此。

关于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所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的回忆，认为是受了魏晋文章的影响，并说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联语评价鲁迅，鲁迅先生并未反对。笔者认为，鲁迅在诗歌中所透露的信息，也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这种影响的存在。

四、鲁迅诗歌所表现的艺术特色

鲁迅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祖国积贫积弱，民族危机极其严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不断的、变本加厉的侵略和掠夺，使清王朝不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民不聊生，使首先清醒的爱国人士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在民主、民族、人文思想方面启蒙、开拓，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首先推崇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和诗歌。但鲁迅写作的诗歌不多，现所搜集到的有 71 首（包括组诗，笔者将组诗在本书中统计为一首），其中旧体诗歌 51 首，占绝大部分（旧体诗的创作可说是伴随鲁迅的一生的，但其中有两次很长的时间间隔，其间没有写诗），其他为新诗和打油诗式的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大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表现了鲁迅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主、民族思想以及孤独的战士的形象。

根据鲁迅诗歌创作的年月，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二个时期。

前期是从 1900 年至 1912 年。这一时期主要包括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日本留学时期和回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低落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多，计有旧体诗 8 首，新诗和讽刺诗 1 首。诗歌多为述怀言志之作，有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有对兄弟情深的表达，有清高自守的述怀和爱国的慷慨热情，以及对友人的不幸的哀悼和愤慨。

这一时期的诗以兄弟唱和、以诗言志的特征较为明显。《别诸弟》、《别诸弟三